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5 年 9 月 27 日 星期日 第 495 期 |
 新民晚报
 | 责编:殷健灵 赵 美 视觉:戚黎明 编辑邮箱:yjl@xmwb.com.cn

B1

野夫：

◆ 朱凌

愤世嫉俗是为了让世界更美好

他说，人一辈子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拿来做“正事”的，聊天 3 小时，冥想 3 小时，抑或写作 3 小时，很难说哪个就一定比其他的更有价值。

他说，写作不在乎有没有稿费，只在乎有没有读者。他的文章几乎都能在网上读到，但是，人们依然会去买他的书。

他说，在今天回望过去，从上世纪 80 年代走来的人，有着共同的精神胎记——理想主义。

这个 9 月，野夫和他担任编剧的电影《1980 年代的爱情》，在桂花香气中走来，于是，有一些东西被唤醒了。



东方 IC 图

1

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人精神上都有理想主义胎记

当许多人在影院售票厅外犹豫着，是选择“小黄人”的无厘头，还是跟着阿汤哥来一次惊险之旅时，带着浓厚怀旧气息的电影《1980 年代的爱情》，杀人这个被好莱坞大片挤占的档期。

这部改编自野夫同名小说的电影，讲述的是三十年前，发生在湖北西部偏远的土家族山区的故事。大学生关雨波，毕业后被分配到偏僻的公母寨乡政府工作。颓废消极的他在小镇借酒浇愁，在供销社买酒时意外重逢了中学时一直暗恋的女同学成丽雯。关雨波被丽雯的温情打动，试图闯进她的生活，但是丽雯内情感始终对他封闭着。

作家野夫担任了这部电影的总策划和编剧，几乎全程参与了电影的工作。在选角时，导演霍建起问野夫，心目中的丽雯和关雨波是什么样的?“我们那代人对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有很好的印象，所以，我心目中的男女主角应该是那样的。”野夫说，自己的想法得到了霍建起的认同。但是，这样的演员找起来并不容易。直到快开机前的一天，野夫接到导演的电话，约他和制片人一起去看演员。芦芳生、杨采钰的样子果然有几分当年的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的影子，再一交流，感觉是对的。

野夫笔下的爱情，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可能无法理解。看了原著，向父母请教了那个时代的种种之后，在拍戏的过程中，两位年轻的主角仍然经常会向野夫求教。

“我记得有一场夜戏，拍的是一个夜晚，男女主角在火塘边上，忽然停电了。对于这场戏要怎样处理，我专门和他们聊过。”野夫说，那是真实发生过的场景，直到今天，自己依然记得当时的紧张，蠢蠢欲动，又极力克制，生怕打碎两人之间的美好。“而那个女孩，在这个时候内心也是矛盾挣扎的。所以，这场戏里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动作，都是值得细究的。”野夫这样告诉两位年轻的演员。

电影首映礼上，俞敏洪、徐小平等许多名人到场，这些人所处领域不同，个性脾气不同，但都经历了那个有点遥远的年代。被问及为何能请到那么多大佬为电影站台，野夫说：“经历过

1980 那个年代的人，都有过共同的人生际遇，精神上有共同的胎记——理想主义情怀，这份情怀到现在依然没有磨灭。”

2

文本实验主义者
想尝试母语的每一种表达

做过许多职业的野夫，在四十多岁时，选择回到文学。“当我还是少年时，我就有一个作家梦。二十多岁时，我已经是湖北省的一个活跃的诗人了。当人生走到了四十多岁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自己到北京来，不是为了做商人的。”野夫说，“有一句话说，不要因为走得远就忘记了出发时的目标。对我来说，文学的梦想一直在心上。”

野夫的写作与一般作家不同，他自称“文本实验主义者”，想把母语的各种文体都尝试一遍。“我觉得仅仅做诗人、小说家、编剧是不够的。”野夫说，现在只剩下话剧还没有尝试过——他的标准是，必须写出来并且搬上舞台才算完成。不过，这尚未完成的话剧，他也已经在写了，写的是父辈的故事，关于人生选择的艰难。那么，当所有的文体都尝试过了之后呢? 野夫想了想说：“这些都完成之后，还是想好好地写长篇小说。”

做过书商的野夫，在写作时从不考虑作品是否要出版。他说：“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是否发表，是否出版都没所谓。我只在乎是否有读者可以看到——现在有互联网，只要能影响一部分人的心灵，管他有没有稿费!”有意思的是，虽然野夫的文章能在网上找到，可是，当那些文字被印刷出版，变成一本本书的时候，依然畅销。那些喜爱他文章的读者，即便已经熟读那些文章，依然愿意买一本书，将那些文字连同白纸黑字间的情怀，一同收藏。

3

过日子要接地气
写作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

如今的野夫居住在大理，一个背山面海的所在。外人看他，好像每天都在休闲度假。他说，自己在写作这件事情上，不会给自己紧迫感，想

动笔的时候才动笔。

野夫的住处经常有访客到来，那些不同年龄，不同职业，带着不同期待的人，用各种方式找到野夫。许多从未谋面的人会通过微博联系他，相约见面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小伙子通过野夫的文章，推测出了他的居住地，直接找到了那个住宅小区。

这个小伙子从广西赶来，背着五六十万字

的文稿，为的是让野夫给他一些指点。野夫请他吃午饭，还批评了他的小说。“那个年轻人是从农民家庭走出来的，在一家夜总会里做木匠。他写的小说，是一个男孩和一个艺术家的女儿恋爱的故事。开篇就描写了那位艺术家和女儿的对话。一看就完全是臆想出来的。”

野夫问这小伙子：“你在生活中见过艺术家吗? 接触过艺术家的女儿吗?”小伙子摇头。“你为何不写自己熟悉的生活，比如农民工的生活，或者，你在酒吧工作时观察到的人和事?”

作家要写出打动人心的好作品，就要沉入生活中去。提笔写的时候，要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。野夫经常这样告诉揣着文学之梦，前来求教的年轻人。而他自己称得上是身体力行的典范。

接受采访的当天中午，野夫赶去参加了一位大理当地的 90 后年轻村长的婚礼，那个村长是一位白族青年。婚礼沿袭的是白族的风俗。那位年轻的村长交友甚广，野夫和一群诗人、艺术家、画廊老板等各种职业的人坐在一桌，感受着白族婚礼的风情，很快就热络起来。野夫说，自己是天性快乐的人，到哪里都很容易交上朋友，而这也是最接地气的生活。“中国那么多地方有新移民，如果他们都不和当地的原住民发生关系，不愿意融入当地的文化、生活，那就会产生非常多的族群矛盾。我作为一个读书人，一个写作者，在一个地方生活就要与当地人交朋友，要接地气。”野夫说。

● 人物简介

作家野夫，本名郑世平,1962 年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。发表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论文、剧本、报告文学等约一百多万字。2006 年获“第三代诗人回顾展”之“杰出贡献奖”；2009 年获“2009 当代汉语贡献奖”；2010 年获台北 2010 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大奖。代表作品：《乡关何处》《父亲的战争》《身边的江湖》等。

对话

曾经，文学是中国人的思想启蒙

星期天夜光杯:您在文学这条道路上探索前行的过程中,有没有什么人对您产生比较大的影响?

野夫:我和沈从文先生都是武陵山区长大的,有着相似的语言和文化背景,他的作品给我的影响很大。我的小说《1980 年代的爱情》,也是在向《边城》致敬。

星期天夜光杯:文学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,在 1980 年代和当下,有没有不同?

野夫:在 1980 年代,大量的好作品井喷式爆发,许多现在活跃在文坛的作家,都是在那个时候崭露头角的。当年,半个中国都沉浸在文学之中,一份省级的文学刊物都可以卖几十万份。那个时代,文学是一种思想启蒙。

星期天夜光杯:您写过您的亲人、您的朋友,您曾说,自己的写作是还债式的写作,要让身边的亲友在您的文字中不朽。文学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?

野夫:对我而言,文学是带有使命感的,这一点从未改变。在中国,无数个家族的命运与国运紧密相关,我的父系、母系的家族,我写出来的和还没写出来的,确实是能够旁证 20 世纪中国历史。就我所知,中国类似我家族这样的故事,还有太多太多。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,从未来的历史来看,我认为是悲惨的一个世纪,这个世纪,这个民族受到了巨大内伤,这种内伤到今天为止都远远还没有痊愈。

这些历史,我更想在我们这个时代,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,去改造这个时代,去推进这个社会的进步,去提升一个时代的文明,这是我想做的事。

我的作品中,《江上的母亲》是最有名的,因为我母亲这种死的惨烈的方式最让人难受纠结。我外婆 78 岁离世,在中国就算寿终正寝了。但是我写外婆比写母亲要用力得多,也用情得多,因为我从小是外婆养大的,从接生到抚养我,在我生命最垂危的年代救活我,更要是我外婆给了我教养。我外婆是那种纯慈爱的,一个从来没有发过火的老人,我对我外婆的感情本身胜于对我父母的感情。我知道我骨子里面有一种善的东西,也是外婆给我的。

星期天夜光杯:您的人生际遇如此坎坷,可是,在和您的对话中似乎并没有感受到那种愤世嫉俗的情緒。

野夫:我们所有的愤世嫉俗,都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更美好。内心有愤世嫉俗,但没有必要天天挂在脸上。